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中华兵学的魅力

*The Magic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artial Cul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兵学文化引论

张文儒 著

中华兵学的魅力

The Magic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Martial Culture

——中国兵学文化引论

张文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张文儒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ISBN 978-7-301-13961-5

I. 中… II. 张… III. 军事—文化—研究—中国 IV. E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8986 号

书 名：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

著作责任者：张文儒 著

责任编辑：刘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961-5/G·239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6.5 印张 45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作者的话

还在十数年前，即1997年，我相继发表了《中外名战与名帅——兼论东西方兵学文化意识》和《中国兵学文化》两本学术专著。限于当时的研究状况以及资料方面的原因，后一本著作主要是论述先秦与两汉这两个历史段落的兵学文化著作。其后历史时期的著作虽有所涉猎，但未能充分展开。此书出版后，我总认为是一种缺憾。因此，自那以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艰辛研究历程。近几年从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以后，便有了时间上的保证，终于有可能对余下的兵学著作重新审视。这样，就产生了增订《中国兵学文化》一书的想法。经过了大约十年的潜心研究，以及对相关学术内容的再咀嚼，对于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兵学著作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同时，对于先秦及先秦以前的兵学文化发展史也有了新的发现。贡献在读者面前的《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就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

与《中国兵学文化》一书比，新增订的部分如下：

- 一、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列为全书首章）
- 二、《管子》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四、李筌与《太白阴经》
- 五、《百战奇法》里的兵学文化思想
- 六、成吉思汗与天、地、人
- 七、《投笔肤谈》
- 八、戚继光与《纪效新书》
- 九、《曾胡治兵语录》

由二至九分列于二章之后各个章节；并且补写了汉唐与宋、元、明、清两段

战史概要。除了上面九部分是新写的外,还有两个题目是重新写的。这两部分是:

孙武和《孙子兵法》,《左传》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增订,仍然遵循我原有的思路,书的着力点不是具体的兵学内容,而是透过兵学本身,发掘隐藏在兵学内容背后的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与人文睿智,目的是对于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华兵学文化的阐发有所助益。如果用一句简明易懂的话说:本书的思路不是武戏武唱,是武戏文唱。

细心的研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的章节编排,文体上是按照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这样的顺序进行的。从外观看,像是一部中国兵学文化发展史。但我的初衷,并不是写史,书本身也不以史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论为主,即以申述文化内容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如上所述,本书的着力点在文化本身,在于凸显中国兵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于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与严格的理论推导,证明中国兵学,像儒学、易学及其他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它同其他的文化形态不是对立,是兼容和互补的;它不应被打入另册,相反,其优秀内容应大力发扬。

二是,如果写成兵学文化史,那么,史的特点就要相当地突出。史实、人物、著作要过细挑选,各个朝代的著述应相互交接,且彼此贯通;而且,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应有恰当的历史评价,加之,选材的范围也应更广。所有这些,本书都难以做到。

本书的目的,是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线索,也就是导引,使人们对中国兵学文化的概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使它在中华文化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要这一点讲透,也就达到目的了。

论述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

2007年7月于北京大学

序 言

中国兵学，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像儒学、易学、道学及其他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中华文化概括为“兵、医、农、艺”，兵列榜首，这可能是为了说明中国是一个兵学思想发源较早而又著述颇丰的国度。从某种特定的视角看，也不无道理。

中国的兵书有多少，未曾有过精确统计。有人说，自古迄今，称得上兵书的，至少二千种。这一估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一点：在堪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化宝库里兵书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兵学典籍，不只卷帙浩繁，内容博大；而且“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包含的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

中国的兵书，特别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兵书，也同其余的重要学术著作一样，表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有品质。只须浏览其中几本，便会感觉到其有一种独抵华屋之下，一览群小的气度。虽说言兵，但不限于军旅之事，而是拓宽视野，将经济、政治、人文意识、宗教心理、艺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要素，统摄于一体，使人获得一种整体印象。常常通过形象而生动的例证，给人以哲学与文化的教益。

中国兵学著作在写作风格方面也不无特色。无论是专门的兵书，或有兵学内容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大多谈今论古、气势磅礴，笔不涉同，辞有异彩。因而，人们在阅读这些书目的过程中，受其感染，为之叫绝，并非出自偶然。

中国的兵学，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受到特别的重视。这几乎已是各种学派的共识。如《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著录了“兵书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其中言道：“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孔子曰：为国者足食

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又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些记载对中国兵学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明确肯定和概要说明。

从东汉以后到魏晋，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虽说其中某些历史段落，人们对兵学仍给予一定的重视，但在总体上，它失去了昔日的显赫与光彩。历代的统治者注意力集中在用儒家（有时用道家）学说教导子民与安邦治国，无形中降低了兵学的社会地位；有的历史段落还故意将兵学著作“闭锁”于深宫之内。但即使如此，兵学文化也没有销声匿迹，它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而且，只要有机会将其庐山真面目昭示于天下，依然会引起人们的惊愕与赞叹。

一位伟人谈到西方古代文化时曾说过：希腊奴隶社会的文明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但它并不随着那个时代的消亡而消亡，它具有永久的价值与永恒的魅力。读到中国古代的兵学著作，人们也会有这种感觉。

怎样对待中国的兵学文化，大抵有两条思路，一条是就兵言兵，把兵学仅仅看成是谈论兵戈剑戟、攻占杀伐，或者扩展为战略学、战术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建设等一类的学科。在这条思路下，人们关注的只是兵学内容，而较少涉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另一条则是不为具体的兵学内容所限，是透过兵学本身，着重发掘其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与人文睿智。在后一条思路下，人们虽然也会看到体现兵学特点的“雕弓宝剑”和“残钺折戟”，但看到更多的东西却是藏在其背后的中华民族的人文意识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底蕴。

本书是沿着后一条思路研究的。所研究的对象，确切地说，不是纯粹的兵学理论，是兵学文化意识。

谈到文化意识，不妨把兵学文化意识的特点略作说明。

文化，是一种社会群体生活状态；从一定的角度说，也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就文化自身的性质言，作为人体运用自己智慧的成果，属于软件。然而，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硬件是软件的产物，软件又是推进硬件再展拓的力量，无论是人类祖先的简单思维和现代人的智能化计算机都是如此。人们之所以把文化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软件誉为时代之花，正是缘于这个道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它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可以从许多层面去认识。从区域划分，有所谓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从内容划分，有所谓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及认知文化；而在中国的认知文化里，又包括儒学文化、道教文化、佛学文化、易学文化、兵学文化等。

兵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意识,常常反映出自身的特色。

有人把文化看成是两大类精神活动,一类是数学、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科学物化的技术;另一类是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两类都是精神创造活动。兵学文化属于其中的哪一类呢?当然,从宏观看,它属于社会科学类,理当为后者;但如果仔细推敲,恐怕也含有某些自然科学特点。确切地说,从它重视对于事物性质的判定和精确的数量计算而言,类似于自然科学;而从它体现出的学说内容评估、思维特色及人文睿智,又近似于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它是这两类精神活动的有机结合或化合,而不是机械的混合。

除此以外,就中国兵学文化里的思维特色看,它至少还有整体性、兼容性和思辨性三个特点。

中国古代人的思维定势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的整体性。在面对某一对象时,常常不局限于对象本身,是把对象与对象,对象与环境连在一起,探寻其运行的内在法则。有人叫它是“朴素的整体性思维”,也无不可。瑞士著名兵学家约米尼有句名言:战略学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战场。这一评述正适合于中国兵学理论。如在分析构成战争的要素时,孙子提出“五事”(道、天、地、将、法);吴子提出“四机”(事、地、气、力);孙臆提出“三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都是严格遵循了整体思维原则。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能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原貌,搜索贯穿于其中的基本法则,避免大的偏向与过失。同时,也使人们的认识水准与决策能力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中国兵学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兼容性。这里说的兼容有不抱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意思。众所周知,我国从先秦时起,就逐渐形成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种学说。作为兵学,自然十分看重“兵”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也正因为“兵”是支撑一座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之一(另两者是经济、政治),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以“兵”为研究对象的兵学,又丝毫不能忽视社会中其他要素的作用。这种实用的性质决定了兵学文化里不固守某种文化观念,或排斥另外的文化观念;也不毫无原则地赞同或附和其中的一种文化观念,更不是把学派之争看得至高无上,而是能在论述某一兵学见解时,使不同的观点相互掺杂、相互吸收,相反相济或相辅相成。例如在兵学论著里,常常渗透有儒家的观点、道家的观点和法家的观点等。也正是中华兵学文化的兼容性格,使得它不容易走向极端。

中国兵学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思辨性。

思辨,本来是哲学思维形式固有的特点,是古今中外的哲学所同具的,但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能把思辨的特点运用得很好。不过,兵学里就有不同。由于军事运动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常常危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和民众死活,又由于这种运动本身的变动不居和难以预知,因而,启用人的思辨能力便显得异常重要。由于思辨,使得人的认识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也由于思辨,使得人们对已知与未知、对未知的不同认识取向,以及历史的因素与现实的因素,都能及时地把握并加以比较、鉴别、吸收,从而可能得出一种合乎事物自身发展法则的结论。同样的缘由,也使得兵学理论成为一种生动活泼和奋发向上的科学,而避免其刻板、凝固和濒于萎缩。

中国兵学文化意识里,既有如上所述的整体思维、兼容性和思辨性等诸多的特征,兵学文化的研究者们便应当不停留于兵学著作里的表面字句,而应能透过兵学内容,发掘其人文意识、思维特点与文化内涵,也就是力求把贯穿在兵学著作里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智能特色及文化底蕴的东西抽取和剥离出来,使之得到提炼与升华,从而对现代人有所启示与教益。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棵茂密参天的大树,那么,中国兵学文化便是这棵大树上的一支枝干与花朵。人们透过这些枝干与花朵,可以毫无障碍地窥见整棵大树。

本书之所以以“中华兵学的魅力”为题,理由全在于此。

最后谈谈本书研究中的取材范围。

对兵学研究的取材范围,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取向:

第一种,以宋神宗元丰年间由官方明令颁布的“武经七书”为对象。这七本书是:《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持此一取向的理由是,“七书”的裁定,是自汉代以来各个朝代史学家们对各类兵书认真搜集、整理、筛选和鉴定的结果。不仅有据可考,而且经过世代的延续,在学术界似已成共识。

第二种,不赞成将兵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武经七书”,而主张将视野伸展开来,即是除专门的兵书外(不限于七书),能从更为广泛的哲学、历史、文学著作里,搜寻并概括兵学文化的内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假若就兵学论兵学,势必会有很大的局限;只有开阔视野,广泛取材,才能使兵学研究依托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并使其中许多精彩内容在经过一番提炼、升华后,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接轨。

本书的写作,采取第二种取材方式。在有关章节里,将《老子》、《管子》、《左传》、《商君书》、《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里的兵学思想作了专门介绍。对《曹操集》和《诸葛亮集》,也是从兵学角度研究的。此次增订时,又补充了《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太白阴经》、《投笔肤谈》、《纪效新书》、《曾胡治兵语录》等著名兵学文化著作。至于“七书”以外的重要兵书,如《孙臬兵法》,书中加以补正,并专作一章介绍。

目录

作者的话 / 1

序言 /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 1

第二节 中国兵学文化的初期形态 / 16

第二章 孙武和《孙子兵法》 / 26

第一节 孙武的军事业绩及《孙子兵法》问世 / 26

第二节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 40

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 / 55

第四节 《孙子兵法》与现代科学思维 / 63

第五节 《孙子兵法》在国内外 / 69

第三章 吴起和《吴子兵法》 / 75

第一节 战国初期的战争和吴起的生平 / 75

第二节 《吴子兵法》概观 / 86

第四章 孙臆和《孙臆兵法》 / 99

第一节 孙臆和《孙臆兵法》脉络 / 99

第二节 道、人、攻、变 / 108

第五章 先秦其他兵学论著 / 123

第一节 《司马法》 / 123

第二节 《尉繚子》 / 134

第三节 《六韬》 / 143

第六章 先秦其他著作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155

第一节 《管子》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155

第二节 《老子》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172

第三节 《左传》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180

第四节 《商君书》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198

第五节	《荀子》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205
第六节	《吕氏春秋》中的兵学文化思想	/ 213
第七章	汉、唐兵学文化论著	/ 226
第一节	由汉至唐的战争类型及其对兵学文化的影响	/ 226
第二节	《黄石公三略》	/ 231
第三节	曹操及《曹操集》	/ 242
第四节	诸葛亮与《诸葛亮集》	/ 257
第五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 273
第六节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 283
第七节	李筌与《太白阴经》	/ 293
第八章	宋、元、明、清兵学文化论著	/ 307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战争及其对兵学文化的影响	/ 307
第二节	《百战奇法》里的兵学文化思想	/ 311
第三节	戚吉思汗与天、地、人	/ 320
第四节	《投笔肤谈》	/ 330
第五节	戚继光与《纪效新书》	/ 341
第六节	《曾胡治兵语录》	/ 355
第九章	中国兵学与中华文化	/ 368
第一节	兵学与儒、道、法各家	/ 368
第二节	兵学文化与哲学	/ 380
第三节	兵学文化与现代意识	/ 396
	参考书目	/ 410
	后记	/ 412

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中国兵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同儒学、道学等各种文化意识一样,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它的缘起,既有社会历史背景,又有人文意识的根源。其中,远古时期的战争,是形成中国兵学文化意识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谈到中国兵学文化意识,不能不先谈谈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

同世界各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单就战争而言,有过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过奴隶制社会形成与奴隶制社会解体时所经历的战争,最后,还有封建社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战争。正是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中,孕育出中国特有的兵学文化意识。

一、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人们知道,战争不是从有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人曾质疑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原始社会初期究竟有没有战争难以判定。然而,可喜的是,学者们采取迂回的途径,即不是去搜寻古代人类有无战争的直接证据,而是通过对地球上现存人类原始部落的细致观察,已经提供了在人类早期没有战争的间接证据。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早在1935年出版的《三种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格》一书中,就提供出这样的资料:在新几内亚尚存的种族“阿拉佩什族性喜合作,人格特征是温和、亲切、相

互依存、绝不侵犯他人，竞争和占有欲都极弱”。我国社会学家对云南省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美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还发现：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自从17世纪引进马匹以后，每年到一定季节才从事征战，在此以前没有战争。在一些彼此隔绝的爱斯基摩人部落间，战争之类的活动极为罕见。

我国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和发掘，也已经对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八十至六十万年之间的蓝田人，以及距今有六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和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鉴定，结果是从未发现战争的遗迹。

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原始人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处于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由于工具落后，生产能力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很弱，靠一两个人单独生产和生活，几乎不可能；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并能抵御猛兽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侵袭。显然，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再说，原始人群相互之间由于地域广阔，人员稀少，彼此很少有矛盾和冲突，也难以发生战争。

也就是说，在原始部落里，之所以没有战争，不是因为那时的人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或没有某种过盛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的生存方式和环境所致，使他们不可能产生相互仇杀的动机。

那么，我国古代战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回答是：大约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距今约两万年的那个时候。或如历史书上说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有两项我国的考古资料值得重视。

一项是在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音：士玉）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物有石镞，说明此时的人类已经知道使用弓箭，而弓箭恰好也是一种兵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弓箭对于蒙昧时代，乃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①。除了石镞（双棱石镞）外，还有对称的石斧、石粟鉴、陶弹及纺轮等。

另一项资料是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有一道围绕着氏族村落的壕沟。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为防御其他氏族的侵犯而构筑的障碍。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就等于我国最早的战争（即使是防御性的战争）有了物证。这个遗址反映的年代比上一资料出现的时代要晚，是仰韶文化前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期,也就是传说中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生活的那个时期。

暂且抛开考古资料,单就世界范围内的情况看,最初的战争也不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原始部落内部上、下层的分化及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的演变所造成的。中国古时的情况也不能例外。

本来,在原始氏族内部,长时期里维持着一种低水平的原始公有制。由于部落的分散,部落之间基本没有交往,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原先以打猎为生的部落,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为此又需要寻找丰盛的草地。氏族范围扩大,人口增加,并且有了流动。氏族成员的繁衍也产生了同一氏族分化的现象。一个母系氏族分化出若干女儿氏族,还会继续不断地分化。这样,不同氏族间的相互接近、摩擦与冲突的机会有所增加。摩擦的极端形式是战争,起初是带有明显的血亲色彩的原始战争,后来便逐步演变为有经济目的战争。战争促使了氏族内部上层与下层的分化;反过来,氏族内部的分化又带来了氏族首领更强烈的占有欲和统治欲,酿成了更大的和更频繁战争行为。不过,目的只有一个,掠夺对方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包括财富和劳动力。

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及后人对史前时期的猜测与追忆,提供了在中华大地上一幕一幕战争的鲜活的画图。

中国最早出现的氏族部落是黄帝部落,居于姬水流域,也就是现今陕西一带,黄帝又号轩辕氏、有熊氏。另一个著名部落是炎帝部落,居于姜水流域,以姜为姓。还有一个部落是蚩尤部落。蚩尤部落亦称九黎族,居于长江、淮水之间。他们都是一些部族联盟。由于经济利益的摩擦,开始有了部族联盟间的冲突。起先是炎帝部落向东发展,和黄帝部“战于阪泉之野”^①,黄帝部落取得胜利。蚩尤部又北上,黄帝部落又和蚩尤部落“战于涿鹿之野”^②。黄帝部落再次取得胜利。这样,黄帝部落自然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既然黄帝部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部落联盟,此部落及其后裔对周边的其他部落也就起了统治和监督的作用。史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③;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帝汤受命,号称三千^④;周武王会八百

① 《史记·五帝本纪》,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亦见《国语·晋语》(四)。

② 《史记·五帝本纪》,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南。

③ 《史记·五帝本纪》。

④ 《尚书大传》。

诸侯于孟津^①。上面说的八百、三千、万国云云，是形容不胜其多，当然不会是实际数目。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样的数字也很可观。

上面说过，黄帝部落原本住在中国西北方，由于接连打败了九黎族与炎帝部落，就闯入了中原地区。由于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创造出了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古代文化。如人们所熟知的，炎帝即神农氏，是我国远古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用木制耒耜（音四），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黄帝部下也有许多有才能的人，发明了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炎、黄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举世所公认。

可以断言，中国最古老的战争正是从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联盟间的争斗开始的。

根据传说与神话，中国远古时代居民分布大约是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既然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已入主中原，那么，处于其他方位的部落群则是东夷、西戎、南蛮与北狄。

在东边的夷族群中，太皞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首长，太皞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夷族演进到春秋时，还留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大抵是太皞后裔。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称为狄族、戎族。其中的犬戎族，自称其祖先为两只白犬，大约以犬为图腾。其中的熏鬻族号称强族，它是秦汉时期匈奴的祖先，与黄帝族发生过多次冲突。居住在南方的统称蛮族，其中的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所谓九黎族是九个部落的联盟，其著名首领为前面提到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分掌八十一个氏族。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首，吃沙石，又说他们铜头铁额，目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大约是以猛兽为图腾。由于九黎族人勇悍善斗，相传曾驱逐过炎帝部落，直到涿鹿（今河北省怀来县或涿鹿县）。只是由于炎帝部落联合了黄帝部落，同九黎族来了一场大械斗，才使得蚩尤被杀，九黎族一部被迫退回南方，另一部则留北方，建立了黎国，还有一部分被炎帝部落俘获。后来，西周时有黎民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在黄帝族击败炎帝族后，族与族之间的战争从未休止。其中另一个强大对手是南方的苗族。苗族的首领叫祝融，是重黎的后代，以后又分化为昆吾、苏、顾、温、董等八大姓。下面又分若干小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群。苗族又称三苗或有苗，在许多史书里都有记载。

^① 《史记·周本纪》。

《韩非子·五蠹》里便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①，有苗乃服。”意思是：舜为了使有苗臣服，乃修改偃兵，加强教育与感化工作。三年之后，派车队手执盾牌和大斧作道具对着苗人跳起舞来，苗族就降服了。像此类事件，在《尚书》、《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齐俗训》里都有大致相仿的记载。

黄帝部落既打败了炎帝部落，又打败了夷族与黎族，现又同化了苗族，于是，便成就了黄、炎、夷、黎及苗的一部分的大融合，成为春秋时期的华族，也就是我国汉代以后汉族的基础。

黄、炎、黎三族部落联盟，涵盖了近一百个或一百多个小的氏族，这些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战争中俘获的人称民，如黎、苗人当俘虏称黎民、苗民。我们通用的黎民百姓的称谓也缘于此。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苗族部落通过战争而融合的过程，是传说中（形成文字的尧典有少量资料）尧、舜、禹三位部族首领的禅让过程。此三位首领也是三位大酋长，他们的共同祖先是传说中的黄帝。不过，在这中间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以禹为界限，在禹的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在禹之前，原始公社所有制还处于发展和巩固时期，到禹这一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劳动工具改进，例如，人们已学会凿井、造车，并开始用上铜制兵器，同时，剩余产品也在增加，再加上攻苗大胜，许多俘虏加入了生产者队伍；这些因素的渗入，加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的形成，使得原先的原始公社公有制开始呈现瓦解的态势。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与战争行为的嬗变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的最初形成，是通过无数次的战争行为实现的。只是那个时期的战争还属于原始部落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很少有经济内容。虽说，偶然也出现过大的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如《国语·周语》里记载的华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战争^②。但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华族内部，也就是作为华族最高统治者的王子与分散在周边地域的地方长官——诸侯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目的逐渐地由夺取自然资源演变为侵吞其他部落的劳动成果，争夺劳动力，以及把战争俘虏作为奴隶。这

^① 干戚舞——干是盾，戚是像斧一样，都是最古老的兵器。

^② 这里所指的是周穆王与藏族中以犬戎为首领的战争。相传，此次战争中，穆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